終古相伴海與山

——蘇東坡與王安石的人和文

高大鵬

有宋一代文風鼎盛，而北宋一朝更是英哲輩出，在這樣短而又多事的時間裏竟然同時出現了這麼許多偉人，揆諸史乘，其空前的盛況眞是不能不教人驚異的，而更驚人的乃是，這些人物又都不只是一方面的偉人，而竟然是多方面的偉大，這樣的勝境在歷史上更是罕有其匹的了。所謂多方面的偉大，此地用的乃是左傳上所記載，所盛稱的標準，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謂三不朽，而這三不朽正是歷來中國文人用以安身立命的最高準則；在這三件事裏個人因才具不同與環境互異，每每只能偏主而鮮有全能，然而北宋的文人却得天獨厚地獲致了全功。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就是個中的典型，他們多方面的成就使他們成爲多方面的偉人，在中外歷史上是眞堪不朽的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爲不朽雖無二致，但其樹立的典型却情態各殊，就像美國著名的「人面石」一樣，同樣地偉大却偉大得不同，任誰也能分出哪是林肯哪是羅斯福，同樣歐陽司馬在後代心中也各有不同的風貌，可幸的是在彼邦的豪傑都能相輔相成，華盛頓與傑弗遜合力同心地締造了美國，不幸的是大宋的英哲却未必都能互相體貼其異己之處，致使其不同的偉大不能相加相乘反而留給作人有相減相除之恨，北宋的積弱雖非一故，而黨爭之害要不得辭其大咎，本文不擬在其政見與功業上多做議論，而只是想從其典型的不同上找出其表現在文學上殊途的原因，也就是從其立德的根本上解釋其立言之所以差別的究竟。

在宋朝的歷史上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上，怕沒有比蘇軾與王安石差別更大的典型了，他們所主演的悲劇不止是個人的更是時代的，這個悲劇的結果在個人

造成了兩人終生的遺憾，在時代則影響所至斷送了國家的半壁江山，然而星移物換，歷史既成過去，悲喜也徒供詠歎，是非功過等同雲煙，立德立功也無從追認，可喜的是在這一齣驚天動地的悲劇裏有多少奇偉的詩篇永遠地保留下來了，而由這些詩文裏所反映出的人物典型也鮮明地流傳下來了，所謂「人生有盡，藝術無窮」（哥德語，見浮士德），歷史的趣味在人物，人物的趣味在性情，而性情之表現在詩篇，從詩文評鑑人物，這是研究歷史的方法，從人物瞭解詩文，這是研究文學的途徑，而人物的研究非比較不能辨其個性，文學的研究則亦非比較不能見其特色；不同的典型必有不同的人生觀，而人生觀之不同正所以造成其文學觀的互異，而文學觀的互異也就自然造成其在文學表現上的不同了。

蘇王人生觀的差異有兩篇文章可以作證，這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又正足以做爲二人文學觀的註脚。這兩篇文章一是蘇的「超然臺記」，一是王的「遊褒禪山記」，雖是兩篇遊記文字却鮮明地吐露了二公不同的心事。在「超然臺記」中蘇軾有這樣的話：「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又說：「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最後更點明了題旨：「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這是熙寧九年東坡四十一歲左右時的作品，這一篇文字最能表現他的人生觀與藝術觀，所謂「有容乃大，無欲則高」的一種「超然」境界。其所以有容，在「無分別」，其所以無欲，在「遊於物外」，是所以「皆有可觀、皆有可樂」，乃至於「無去取之擇、無美惡之辨，能無往而不樂」，是之謂超然，而此種超然的態度是貫穿東坡一生的文學作品的，也是貫徹在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上的，風格卽人格，器識見文章，這「超然臺記」是最明白的一證。至於王安石，則是另一番器識另一派人格了，玆就「遊褒禪山記」作一對證，其文曰：「……其

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隨之，而不得極乎游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在此幾乎引述了遊記的全文，雖只是短短一篇遊記，却生動地刻劃出作者的形象，一個舉火探幽的人。一個不畏險遠以求非常之觀的英雄，而險遠正是他樂之所在，所謂「愈深而愈難，愈難而愈奇」，這幾句話正道出了荆公一生的志節，這是他的人生觀同時也是他的藝術觀，揆諸荆公一生的作爲可以證明他說的不是大話，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氣慨在中國眞是罕有其匹的，也許只有在山海經一類神話中可以找到（如盤古揮斤、夸父逐日），而其所以以悲劇終也就不足爲奇了，這種氣慨表現在詩裏便是嚴峻情深，乃至如歸叟詩話所云：「荆公晚年詩傷工。」所以張戒歲寒堂詩話說他：「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相反地，東坡的詩則兼客並蓄，無所揀擇，喜歡他的則說：「唯東坡不揀擇，入手便用，一經此老手，點瓦際爲黃金，自有妙處，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他人豈可學耶？」（見蘇詩紅事參寥子語），或云：「時雜滑稽，正是其醞藉處。（同上），或云：「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嶷，等於天馬脫羈、飛仙遊戲……」（見說詩晬語），趙翼也說他：「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而不喜歡他的人則評之爲：「玉石夾雜」，或云：「太無揀擇」，或云：「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

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見滄浪詩話），然而這兩種批評究竟誰是誰非，恐怕很難有個定論，蘇詩「無擇」是事實，正如王詩「有擇」是事實一樣，他們背後都各自有一套人生哲學和藝術哲學在支持着，由於人生觀的不同，在蘇則自謂：「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玉田院乞兒，並眼前無一人不可愛。」於王則自稱：「吾心童稚時，不見一物好。」，又云：「寤彼栖栖者，遺世良獨難。」，既「不見一好」自不免要「遺世獨立」，東坡那種度量不是荆公所能分享的，然而荆公一空倚傍，萬人獨往的氣慨却也不易在東坡詩中找到，易卜生在「國民公敵」裏說：「世界上最孤獨的人，常是最堅强的人！」，這豈不也是一種「超拔」的精神？雖「超拔」大有別於「超然」，然而以東坡的「超然」是不會不欣賞荆公的這種「超拔」的，所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這兩句詩正可以見出二人的互相傾慕，這一種深沉的感情不是一般人所能輕易理解的，而這種感情却又不同於白樂天與元微之，那是自始就和諧的，蘇王的感情却是由多少衝突矛盾中錘鍊激盪而成的，它的背後有着兩個偉大心靈的和一個偉大時代的悲劇作背景，他們像是一片廢墟上的兩個巨人，而兩個巨人的心裏却又都各有一片廢墟，彼此惋惜着、憑弔着，在夕陽山外，在渺渺的荒陂。

蘇王的相異固有遊記爲證，而彼此的相近却也有詩爲證，這首詩見於蘇東坡的「潮州韓文公廟碑後詩」：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
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
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
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能望
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
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
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
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王荆公的詩，則見於「杜甫畫像」：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
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

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
醜姘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
惜哉命之窮，顚倒不見收
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
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
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
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
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
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
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這兩篇作品無論在氣象的宏大，詞氣的激越，情采的超邁以及同情的深刻上都很接近，雖然東坡悼的是韓文公而荊公畫的是杜工部，事實上前者悼的是自己，後者畫的也是自己，有趣的是，雖說自畫自悼，却無意間說中了對方的心事，試看：「飄然乘風來帶旁，下與濁世掃粃糠。」，這不正是荊公超拔的壯志嗎？再看：「醜姘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這豈不是東坡「皆有可觀」宏博的胸襟嗎？而所謂「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與乎「公不少留我梯滂，翩然被髮下大荒！」，那種英雄的孤獨感與宇宙的蒼涼感不也大相髣髴麼？所不同者，東坡所表現於詩中的乃如天際眞人，有姑射的仙姿，而荊公則是大地的巨人，有盤古的氣慨，是故「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畢竟是荊公本色，而「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畢竟是坡仙的絕調，在這一點上是誰也不能代替誰的，但是雖說誰也不能代替誰却並不意味着誰也不能欣賞誰，「變化中的統一」是藝術的原則，「矛盾中的調合」則是人性的常情，這兩個不同而同、和而不同的心靈是不會不互相欣賞，互相吸引的；藝術裏「有擇」和「無擇」孰優孰劣恐怕難有定論，人生裏的「超拔」和「超然」誰更殊勝也不易衡量，但世界之大既然能同時造出這兩種人則必也同時能够容納這兩種人並且欣賞這兩種人（歐陽修便同時欣賞他們二人）（註），不論他們之間的衝突有多大，正如海山交會處的亂石崩雲、驚濤裂岸一樣，畢竟最高的山和最深的海是終古相伴的。

註：歐陽文忠公於蘇王二子皆極稱賞提携，其於東坡則謂：「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於荊公則以韓文公相期，而此知遇之恩，二子亦皆載有明文。